

佛教文化丛书

佛学与人生

——近代思想家的佛学思想

麻天祥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佛教文化丛书

佛学与人生

——近代思想家的佛学思想

麻天祥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要 费 客 内

朱学思思，学尉士原，学尉曾名前升返国中
队人，进位前效赠入第丁行县学尉重登明宣
智，并送，一尉前升，国同会并美取时主人善
家，内群世入前学尉丁世国，士面是同不前
群尉，学尉升返丁快，命单为二带前士步群尉同同
尉送，报前通全前容内，志进，点群，国同前次前文
书主尉前同，一尉尉思思尉类人丁示尉，尉关尉尉前
朱学尉尉尉尉尉尉

佛教文化丛书

佛学与人生

——近代思想家的佛教文化观

麻天祥 著

责任编辑 卢海山 许树棣

中古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蒙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875印张 271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7-5348-0748-4/G·169

定价:7.00元

佛教的双相二重否定及近世佛学的

特点——代前言

历史的任务在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目的在于揭示非神圣形象异化的本质。佛教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正是对佛的佛性和极乐净土认识的不断深化，透照人的人性和现实社会的认知过程。

然而，对佛教本质的认识始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就连佛教思想究竟属宗教信仰，还是哲学思辨也持论不一。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客观上佛教思想确实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情感，它的感情的终极依托 (Ultimate Commitment) 不在耶稣、穆罕默德之类超自然、超社会、超人类的绝对权威，它曾经经历对普通人、超人和自心终极关怀 (Ultimate Concern) 的三个不同阶段，最终实现了个体与本体的合一，在自心中树起了信仰的权威，因而表现出以内在超越为主的宗教特征和反观内心、理性思辨的哲学性格。

古印度，居于统治地位的婆罗门，为了维护他们的绝对统治，神道教教，以梵为造物主，宣扬梵口生婆罗门，胸生刹帝利，腹生吠舍，足生首陀罗的婆罗门教派思想。种姓制度严格划分所造成的残酷阶级压迫，使下层百姓不堪其苦。上层社会骄奢淫佚，劳

苦大众啼饥号寒，社会的不平和人类生老病死的苦难，困扰着年轻的净饭王太子乔答摩·悉达多 (Siddhārtha Gautama)。他毅然舍弃养富尊荣的王室生活，出家修道，欲探求人生苦难的原因及解脱的方法和途径。毕钵罗树下趺坐中深邃的冥想，终于证得菩提 (Bodhi)、觉悟四谛、十二因缘之理，遂成佛陀 (Buddha)，后世称为释迦牟尼 ('Sakyamuni)。佛陀鹿野苑初转法轮，佛教具足三宝，以“苦”、“空”观念说法，否定世俗社会的全部内容。佛陀灭度后，佛教四次结集，确立经、律、论三藏和戒、定、慧三学，进一步完善了佛陀的苦空观念，构建起系统的指导佛徒思维和行为的佛教人生哲学。

正是由于“苦”、“空”观念在佛教思想中占据的突出地位，故有人认为佛教的本质精神是“空”，或者认为它的理论基石是“苦”，甚至索性说是“空的哲学”、“苦的哲学”。更有人引申而为“怕死的哲学”，乃至唯心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等等。也有人断言印度佛教的本质是“定”，中国佛教的精髓是“慧”。上述这些看法虽不无道理，但或失之笼统，或流于偏颇。苦、空、定、慧只是佛教精神的表象，“怕死”却是对佛教“无生”、“无死”否定概念的片面逻辑推衍。就本质而言，“苦”是对人生的具体否定，“空”是对现象的抽象否定，戒、定、慧恰是对万象万物实现彻底否定的空灵之法。《维摩经·佛道品》谈到佛道时曾说：“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这一“非道即道”的否定辩证法，正是佛教的本质精神。

就佛教的发生而言，净饭王太子哀绝灾难深重的人生，鄙视宫女们睡态之丑，抛妻别子，悟机布道，佛教就是在对现存社会否定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佛陀不赞成苦行主义的自我虐待，也反对纵欲主义的为非作歹，其不落两边的中道观就是建立在这种

不苦不乐的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否定性思维方式。就其基本理论而言，四谛的苦谛否定一切生命现象和社会关系；灭谛是实现否定的手段；集谛、道谛是以肯定的形式表达的否定的内涵；它们否定万事万物具有永恒不变的自性，把人们引向否定世俗生活的空慧境界。诸行无常否定客观实在，诸法无我否定主体意识，有漏皆苦是苦谛的复述，涅槃寂静则是否定的总和。八不（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去）是否定，断惑、无念更是否定，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中道思想则是对一切的否定。它不仅否定存在，同时否定非存在，即所谓非假、非空。僧肇“虽有而非有，虽无而非无”的“不真空论”进一步从理性思辨的层面上准确地阐发了佛教思维的精华，充分显示“一切空者空其所空”的否定功能。

“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①这首小诗画龙点睛，写出了禅宗的真精神。中国的禅宗上承达摩面壁观心，下启宋儒正襟危坐，其本质就是对佛祖顶礼膜拜的外在超越，转向对自心终极依托的内在超越的否定否定的过程。禅宗实际创始人惠能“菩提非树”、“明镜非台”一偈，传为千载佳话，原因就是因为它道破了神秀偈语的致命弱点——否定的不彻底性。禅宗“不思善，不思恶”，“于相离相、于空离空”，乃至道断语言、不立文字，不诵经，不坐禅，扬眉瞬目，机锋棒喝，就是要否定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所特有的一切理性，以越过逻辑思维程序，凭感性、本能冲击一切羁绊。至于丹霞烧佛、云门呵祖，则是佛门否定精神极端膨胀的必然结果，确实“于空处显示不空妙性”。

① 苏曼殊诗。

所以我们认为，由人异化的佛，其本质就是否定，因此可以说佛教思想是否定的哲学，是否定的人生哲学！

但是作为一个体系，这种否定不是单线一次否定，而是双相二重否定。

首先它是双相否定。尽管小乘佛教主张断惑，强调个人解脱，表现为灰身灭志而达到寂灭的境界；大乘佛教则力主觉悟，坚持普度众生，希望超脱轮回而实现永生的理想，然而它们都是通过对在茫茫苦海中挣扎的芸芸众生的透析，否定现存社会一切的。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自身的否定，侧重于个人心意的彻底解脱；另一方面是对生存环境——社会的全部否定，引导人类寄希望于来世的安乐。前者要求人们断除无明烦恼，不思善，不思恶，等视有情，饶益一切众生，在精神上超越世俗的是非苦乐，达到无差别的涅槃寂静；后者认为三界不安，犹如火宅，以对庄严净土的追求，实现对红尘浊世的否定。上述对主观精神和客观世界的双相否定，以精神解脱和外在超越的方式，表现出一种出世的倾向。

但是，佛教双相否定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显然不符合以儒家入世精神为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它既不能满足中华民族的理论需要，也不适应民族的精神和现实要求，因而强调“是心是佛”，把无心无念的精神解脱转变为对实在的内心世界的追求；着重人的止恶行善，把对庄严净土的外在超越转变为对现实社会的改造。这种对实在的清静自心的追求和对现实污浊社会的改造就是反观人生，是对出世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的二重否定。这种由否定人性出发而达佛性，再由佛性回归人性；由否定现世出发而趋于庄严净土，再把庄严净土置于现世的双相二重否定构成了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性的本质精神。

可见，佛教的否定性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意识，它对社会的改造愿望促使了佛教的入世转向，它对清净自心的追求则是由外在超越转向内在超越的契机，而且它们离源头愈远，膨胀也就愈大。尤其到清末，朝政腐败，强敌益迫，割地赔款，民不聊生，更有鸦片之役，甲午丧师，年少气盛之士尤感国家有累卵之危，民众承倒悬之苦，无不疾首扼腕倡言维新变法，并于“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苦索，以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佛教双相二重否定所表现出的社会批判意识、入世精神以及无限膨胀心力的作用，恰好迎合了当时理论思维和社会革命的需要。因此，有识之士援佛入儒，佛儒兼治，把佛学作为他们的经世之学。其中龚自珍、谭嗣同的社会批判意识与佛教的否定精神的认同；魏源、杨仁山的净土思想，谭嗣同的经世佛学，康有为、梁启超的佛教救世主义与佛教入世转向的趋合；梁启超的心理分析，章太炎的万法唯识，杨度的心物二元论与佛教追求内在超越的心性学说直接相关；还有敬安、太虚的佛教入世精神与工禅、农禅、人间佛教的动议都是中国佛教双相二重否定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在清末民初的具体表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佛教的入世转向至晚清表现得尤为突出。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为了适合以农立国的中国国情，逐渐改变不稼不穡、挂单云游的习俗。至唐安史之乱后，寺院再也没有南北朝时期“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①的丰厚布施，而不得不自谋生计。经济关系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佛教的入世精神。延及清末，寺僧佛教、佛学的衰微和居士佛学的兴起，便是佛教入世转向的新潮。其中彭绍升倡导于前，杨

①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仁山推动于后，欧阳竟无、梅光羲、韩清净、蒋维乔、范古农更是近代居士佛学的大家。寺僧佛学衰微，居士佛学兴起以及上述经世佛学的社会实践也为清末民初佛学增添了异彩。

由于入世精神和改造社会的需要，主张念佛往生的净土宗常常隐含或公开宣传人间净土的思想，因而具有更为厚重的现实政治意味。不但古代帝王利用净土信仰淆乱百姓耳目，劳苦大众也借弥勒下凡向官府兴兵发难。至近代，寺僧、居士、学者也多以净土思想充实其教理教义或经邦济世之学，于是形成以净土宗为归依的诸宗融汇、三教合一的近代佛学新貌。僧人一扫宗门之见，兼采儒道；学者不拘一宗，博采旁收。其时“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①，尤以净土思想入世；政治和尚太虚贯摄八宗、融世出世法一体，以回佛向生，度人利他的净土宗为至上；龚自珍潜心密、净、禅、天台；谭嗣同充分利用禅宗、唯识、华严；章太炎以佛解庄，以庄证孔；康有为更是不拘成法，“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以人间净土为大同理想；杨仁山“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②与此有关的则是化洽中西，以西方哲学和现代科学知识阐扬佛理，更是近代佛学独具一格的特色。

除宗教信仰外，近代佛学还呈现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经世致用，二是文化研究，三是理性思辨。龚自珍、杨仁山、梁启超、李叔同以及欧阳竟无在佛教史、文献、文学、音韵、因明、仪轨诸文化领域内，为传扬中国文化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佛教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值得称道的。另外，弥补传统文化理性思辨不足，也是近代佛学复兴的一个原因。谭嗣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同利用禅宗、华严、法相的思想资料，冶科学、宗教、哲学为一炉，搭起他的经世佛学逻辑结构，“使适于人生之用”^①，确实是一个重大创举。章太炎则以纯理性思辨的形式，以真如本体、万法唯识、齐物论为三个支点，构建起他的法相唯识哲学体系。可以说，在近代，使佛学在理性的层面上进一步升华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的除其后的熊十力外，唯章太炎一人。

谨以此奉献本书的读者。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于西安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内 容 提 要 号 20 字 登 簿 (第 2 次)

本书对中国近代的寺僧佛学、居士佛学、思想学术界的佛学研究即经世佛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它们都围绕着人生和现实社会问题，在信仰、经世、哲学和纯学术的不同层面上，促进了佛学的入世转向，完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对于近代佛学、佛教文化勃兴的原因、特点、形态、内容的全面论述，参照它的终极关怀，揭示了人类对理想境界——即赖以生存的最佳境界的追求。

目 录

佛教的双相二重否定及近世佛学的特点——代前言·····	(1)
第一章 杨仁山诸宗同归、三教一体的净土思想和居士 佛学的兴起·····	(1)
第二章 龚自珍学佛的动因及佛教文化研究·····	(23)
第三章 魏源的净土思想和经世哲学·····	(63)
第四章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和佛教救世主义·····	(89)
第五章 梁启超的佛教文化研究及其现实性·····	(110)
第六章 谭嗣同的经世佛学·····	(185)
第七章 章太炎的法相唯识哲学·····	(226)
第八章 杨度学佛的思想考察及其新佛教论 的特征·····	(269)
第九章 诗禅敬安的禅诗和卫教爱国思想·····	(284)
第十章 近代律宗大师——李叔同·····	(315)
第十一章 政治和尚太虚和近代佛教革新运动·····	(340)
后 记·····	(368)

第一章 杨仁山诸宗同归、三教一体的 净土思想和居士佛学的兴起

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异端邪说，自东汉传入中土以来，为了求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必须适应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满足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要求。因此，它一方面采取妥协的态度，在被拒斥中依附于固有的传统文化形式，以获得立足之地；另一方面展开兼包并容的胸怀，适时地进行自我改造，以谋求在新的环境中熠熠生辉。汉末至唐中七百余年，佛教在中国本土以上述两种方式曲曲折折地滋生和发展起来，并逐渐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渗入到民族的心理深层，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特别是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就此而言，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就是佛教与传统文化斗争并逐渐融合的过程。

宋元以降，佛教外援既失，内部亦衰，隋唐时代各宗纷呈奇葩、禅门五叶齐芳的风流年华虽已显现出衰颓的下世光景，但儒家因吸取禅门辩证思维的养分而重现生机；佛家凭借传统文化的入世精神，逐渐向社会各阶层潜移默化。高居庙堂的达官显贵，远处江湖的文人名士，隐身山林的大德高僧，更是自觉地促进儒、佛、道的融通。这种融通的重点在于促成佛教的入世转向和传统文化

的理论升华，以解决认识的发生和功用，人的价值的实现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佛教的入世转向及其向社会不同层面普及的需要，佛教自身则由繁趋简、由博返约。前此以往各宗分途并进，纵深发展的盛况，逐渐显示出简易、单一的趋向。宗门、教下、南山诸宗合流，殊途同归，特别在近代尤为显著。出现了印光儒释合一之净土，月霞禅教同趣之华严，谛闲禅教会归之天台，以及太虚性相融合、不拘一宗的新型佛教。

与此同时，由于知识阶层理性思维的饥渴以及在西方文明的进迫下，自强图存的需要，滋生起研习佛理，以经术求治术，以佛法求世法的热情。佛学研究渐从佛门转向俗界，居士佛学因之兴起。有清一代，彭绍升、汪大绅、钱伊庵、吴雁舟皆具大善知识，为在家居士中的饱学之士。龚自珍密、禅、净土、天台之佛教文化研究及梁启超的佛教史、佛教心理分析及佛教救世思想，魏源的净土思想及谭嗣同的经世佛学，以至于章太炎、欧阳渐的法相唯识学，无不启迪一时之人心。

上述三教融通、诸宗合流、居士佛学兴起，均为晚清佛学的显著特色。于此贡献卓著者，当首推石埭杨仁山。诚如赵朴初先生所言：“近世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杨仁山承明代诸宗同归、三教一体之遗风，刻经兴学、辨析佛理，鼓铸了居士佛学之新潮，确实于“近世佛教之发展至鉅”^①。

生平事略

杨仁山，名文会，1837年，即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于

^① 赵朴初《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

安徽石埭（现并入太平县）。其父同年举于乡，次年会试中式，授职西部，举家北上。杨氏各种传记材料均记载，母孙太夫人孕杨氏时，梦入古刹，见一巨瓮，覆以箬笠，启而视之，见有莲花盛开瓮口，惊寤而诞杨氏。这一荒诞不经的传奇故事，无非向人们展示他先天固有佛教的慧根并赋予其献身佛教复兴事业以神秘的色彩。

杨仁山十岁受读，甚聪颖。十四岁能文，自视甚高，雅而不喜举子业，唐诗宋词，吟咏为乐。暇则从知交数人，“驰逐声色”^①，联社角诗，尝有“客味鹅儿酒，乡心燕子鱼”等诗句。洒脱飘逸，犹如闲云野鹤。性任侠，习驰射击刺之术。年十七，适逢太平天国起事，在战乱中扶老携幼，一家数十口辗转徽、赣、江、浙间，屡屡转危为安。又曾“襄办团练”，“佐张小浦中丞、周百禄军门理军事，跣足荷枪，身先士卒，日夜攻守不倦”^②。战后论功行赏，固辞不受。

杨氏生平尤“喜读奇书，凡道家兵家以及诸子莫不购置”^③。“流离转徙，舄敝簏贮书以随”^④。“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赜，韞之于心”^⑤。大约在二十七岁前后，他才有志于学佛。曾有一老尼授《金刚经》一卷，“怀归展读，猝难获解”，但“觉甚微妙，什袭藏弄”^⑥。另于皖省首府书市，偶得《大乘起信论》一卷，但“搁置案头，未暇寓目”^⑦。可以这样说，

① 《清稗类钞》3365页。

② 陈西安《杨仁山居士事略》。

③ 《阴符经发隐》。

④ 张尔田《杨仁山居士事略》。

⑤ 张尔田《杨仁山居士别传》。

⑥ 陈西安《杨仁山居士事略》。

⑦ 陈西安《杨仁山居士事略》。

杨仁山在二十七岁前，其实未能真正接触佛典，对幽隐玄远的佛理也是兴味索然。但可以看出，杨氏出身于一个书香仕宦之家，博览群书，性情疏旷，淡于名利，是一个深受黄老思想影响，且在十年战乱中，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知识分子。

1864年，其父故，归葬毕，又身染重病。严酷的现实生活，使他对社会和整个人生发生了怀疑。于是，在病中取案头《大乘起信论》再度展读，“乃不能释卷，赧续五遍，尽窥奥旨。由是遍求佛法”，“潜心道学”^①，与佛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后在坊间书摊上见《楞严经》，“就几讽诵，几忘身在书肆”^②，完全沉浸在大乘佛教无法不备、无机不摄的心性冥想之中。直至日暮，摊主催归，不得不释卷而回。自此，尽弃所学，专心学佛，凡亲朋好友外出者，必托寻求经典。每见游方之行脚僧，必询其从何处来，到何刹去，有何经册？广泛搜求佛经，认真研习佛法。

1865年初至金陵，得经书数种。翌年移居南京，主持江宁工程。同事王梅叔邃于佛学，二人相得益彰。因有感于十年战乱之后，江南佛教典籍文物遭毁殆尽，遂与魏刚己、曹镜初等学佛同志互相讨论，“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③而当时颁定《龙藏》，久成具文；径山藏本，毁于兵焚！至欲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也不可得。于是发心重刻方册藏经，俾广流通。他起草章程，得同志十余人，分任劝募。当时赞助最力者是人称“佛中之儒”的江都郑学川。其人曾创江北刻经处，著《楼阁丛书》三十种，后披剃出家，号妙空子。于是，杨仁山在金陵顺序安排，筹画刻经事业，首刊由王梅叔处所获魏源辑注之

① 《杨仁山居士遗著·事略》。

② 陈西安《杨仁山居士事略》。

③ 陈西安《杨仁山居士事略》。

《净土四经》。他于公务之暇，潜心佛学，校勘刻印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常至漏尽就寝。

但由于其在所办工程中身兼数事，夙著辛劳，深以障碍学佛为苦。及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乃摒绝世事，家居读书，专究佛乘。虽有北洋李文忠函聘，亦坚辞不就。家居期间，参考造像量度及净土诸经，静坐观想，审定章法，聘画师绘制《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大悲观音像》，并搜得古名人所绘佛菩萨像，刻版流通，以资供奉。次年，泛舟游历苏、浙，礼舍利、朝梵音。当时传闻洞庭西山有古刹，估计必有大量经书，只身独往，搜求殆遍，却一无所获。且因化费较大，致川资缺乏，几不能归。其时家计日趋艰窘，故复就江宁筹防局公务，以解生计艰难之急。

自1868年筹划刻经事以来，数年之间，间断所刻之经渐增，便择定金陵北极阁，集资造房，以为贮藏经板之地，并聘僧人主持。大概就在这时，筹建金陵刻经处的设想已成。但因房产纠纷而起争端，不得不移经板藏于家中，并请友人专主刻经事。此后虽离南京，但刻印事业始终不辍。

1875年经理汉口盐局工程。次年，赴曹镜初约于湘，商议长沙刻经事务。同时兼受曾纪泽聘，襄办传忠书籍。此时，览南岳之胜，登祝融峰顶，益增其山河人民之思。

1878年，于不惑之年，随曾纪泽出使英法，考察法国政治、经济、教育甚详。旁究天文、显微、测绘等学。自制天地球图及舆图尺，以备将来测绘之需。期满归国，仍以刻经为事。

1882年，于苏州元墓山香雪海觅得藏经板，如获至宝。越三年，应刘芝田召，随往英伦，考察英国政治、制造诸学，探求资本主义列强发达之原委。在英国结识当时正在牛津大学专究梵文的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其后，他们书信往来不下数十通。杨